

凤凰文库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刘东主编



THIS CULTURE OF OURS

斯文

唐宋思想的转型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美」包弼德 著

刘宁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凤凰文库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刘 东 主编

THIS CULTURE OF OURS

斯文

唐宋思想的转型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美」包弼德 著

刘 宁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包弼德著;刘宁
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9
(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书名原文:“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ISBN 978-7-214-20733-3

I. ①斯… II. ①包…②刘… III. ①士—研究—中
国—唐宋时期—英文 IV. ①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0749 号

“*This Culture of Ours*” by Peter K. Bol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1992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ww.sup.org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17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1998-112

书 名	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
著 者	[美]包弼德
译 者	刘 宁
责 任 编 辑	卞清波
装 帧 设 计	陈 契
责 任 监 制	王列丹
出 版 发 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36 插页 4
字 数	486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20733-3
定 价	7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总序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惊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译介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

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Peter K. Bol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根据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译出

初版序

大概除了在中国,没有哪个国家会出现这样一部思想史:它横跨六个世纪,同时也是一部政治史、社会精英史,以及对文学价值观的研究,我就是在这些领域的结合处写作,因为我相信,思想史、政治史、社会史以及文学史,虽然是不同的学科,但对于理解唐宋思想的转变,都是必要的。我同时也是从唐宋思想生活的内部来撰写,使用当时的术语和观念。翻译不能百分之百地传达思想材料的意义,但从当时的语境出发阐释当时的作品,却能使我们看到学者们询问的问题如何变化,以及他们走向那些共同关心的问题的方式,如何出现了分歧,从而更切近地解释历史变化。

在中国史研究中,撰写一部跨越几个世纪的著作,这样的工作尚未让人望而却步。这部书一开始并未想到会有如此规模。我最初研究苏轼及苏门,进而研究 11 和 12 世纪的思想文化,这是这部书的起因。为了寻找北宋精英文化的来源,我上溯到唐代后期的历史,而要估价其间的发展,就有必要与初唐的学术进行对比。当我开始探究唐代后期与北宋的思想创造如何与唐代门阀文化的消失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也逐步理解了,新儒家运动在什么意义上与众不同。研究的结果就形成了这部书,它比我设想的更长更广,不过仍然只是选择了某些时期的某些人物

和典籍进行讨论，以此来佐证某些论点——如果用全面考察唐宋思想文化标准来看，我没有解读的典籍和没有提到的人物都是太多了。

我特别受益于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学的学者，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他们的研究使我们有可能来思考这里所讨论的六个世纪。如果离开麦大维(David McMullen)对唐代学术的研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关于诗歌的著作，以及贾志扬(John Chaffee)、伊沛霞(Patricia Ebrey)、韩明士(Robert Hymes)、姜士彬(David Johnson)对社会史的研究，就不可能有这部书。多年来与傅君励(Michael Fuller)和宇文所安的交谈，以及阿尔伯特·克雷格(Albert Craig)、伊沛霞、艾朗诺(Ronald Egan)、傅君励、孔飞力(Philip Kuhn)、麦大维和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所提的意见都使我受益良多。我感谢约翰·齐默(John Ziemer)为此书所做的编辑工作，尤其感谢他从一个审慎读者的角度所提出的建议。我感谢张力和徐必经指出了注释中的错误。最后，感谢王氏研究生院(Wang Institute of Graduate Studies)所提供的中国研究奖学金，它使我获得了一年时间，放下其他工作，专注于此书。

包弼德

再版序

某些学问始终是国际性的，科学即是如此，在人文领域也有类似的例子。我写作《斯文》，主要是面对英文学术读者，但在中国有更多的人对它感兴趣。何以如此？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学者更喜欢不受哲学、文学、社会和政治等学科的束缚，而当今的美国学者则更愿意在学科之间严其畛域。

写作《斯文》时，我集中研究三个问题：一、中国的精英（我指“士”）如何转变，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二、“士”的价值结构以及世界观如何转变，这是一个思想问题；三、社会之变与价值结构之变，其间的关系如何。这本书的方法论，在英语里被称为“心智史”（intellectual history）。心智史和（汉语中所说）“思想史”的区别在于，心智史更加关注“观念”（ideas）与社会的关系。要分析这种关系，当然有许多不同的路径。

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是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他的心智史研究，是这类研究中最好的成果之一，体现了法国 20 世纪所兴起的一种学术兴趣，那就是将观念研究与社会研究相联系。^① 夏蒂埃认为，“社

① 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心智史还是社会文化史？》（*Intellectual History or Sociocultural History?*），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和史帝芬·卡普兰（Steven Kaplan）主编《当代欧洲心智史》（*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绮色佳：康乃尔大学出版社 1982 年。

会文化(sociocultural)史”,比心智史的内容更加丰富,它以“观念”研究为核心,但如果译为中文“社会文化史”,就很难呈现这种核心特点。

心智史研究的困难之处在于,它必然是多种研究方式的综合。单纯的社会史研究,会观察指导社会实践和人们心态结构的潜藏假设与价值构成,这些心态结构人们已经习焉不察,或者简单地认为是自然天生的。这就是所谓的“心态”(mentalities)研究。^① 尽管我这本书是关注知识分子(literati),但有些内容是通过心态研究来揭示大众的心态结构。纯粹的“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研究,则是就观念论观念。这方面最伟大的代表作是洛夫乔伊(Arthur Lovejoy)的《存在巨链》,此书提出有一些基本观念(即“观念元”unit ideas),在历史上成为构造心智生活的基本元素。这些基本观念尽管以不同的语言来呈现,并不断适应新的思想形态,但其内涵相沿不断。它们可以最先出现在一个领域(例如哲学),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再度出现,并适应新的形态,进入其他领域(例如文学)。^②

“心态史”和“观念史”的研究方式,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心态史研究认为人们的生活并非随机,人们共同拥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会影响其如何看待并回应自己周围的世界。观念史认为,观念(什么是“观念”?这其实是个问题,我接下来会讨论)是变动的。对观念的研究必须关注思想生活的所有领域;“观念”在文学中的表现,与在哲学中一样多。

① 彼得·伯克(Peter Burke)《心态史的优势与劣势》(Strengths and Weakness of the History of Mentalities),《欧洲观念史》(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第7卷(1986),第5期。

② 阿瑟·洛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之历史的研究》(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马萨诸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36年。洛夫乔伊在一个关于弥尔顿《失乐园》的讨论中,谈到他的学术立场意味着什么,见所著《观念的历史编纂》(The Historiography of ideas),《美国哲学学会论文选》(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第78卷(1938),第4期。洛夫乔伊的想法催生了许多著述,其中包括《观念词典》(Dictionary of Ideas)以及《观念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从他的想法出发可以做很多工作——在不同的语言和专门史之间做交叉研究——这仍然值得重视,参见安东尼·葛莱夫顿(Anthony Grafton)《观念史:规则与实践 1950—2000 及其周边》(The History of Ideas: Precept and Practice, 1950—2000 and Beyond),《观念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第76卷(2006)。

但是,两条道路都有问题。心态史的研究可以揭示深藏的世界观,却不能解释那个世界观为什么发生转变。观念史将观念看作永恒不变和超时间的,忽视了同一个观念何以在不同的环境中会有不同含义。而且,观念史忽视了思想文化如何通过多种“专门史”的交汇而成型。莫里斯·曼德尔鲍姆(Maurice Mandelbaum)使用了“专门史”(special history)的说法,我这里就采用这个说法,他指出哲学史,就像艺术史、科学史和文学史一样,是“专门史”。“专门史”是在后人不断回应前人的问题,并对前人的著作不断推进深化的过程中形成的。^①诗学实践就建构了一个专门史,新儒家的哲学话语(philosophical discourse)也是。专门史之于其所存在的社会,有相对的自主性,其发展并不由时代的社会环境与经济环境所决定。如果说被后者决定,那就意味着社会是一个封闭、完整的体系,而事实并非如此,社会是由错综的利益所组成,在延续不断的社会演进中,这些利益相互交织,形成各种动静起伏。

我在本书所采取的研究方式,与两个潮流有关,一者出自英语世界,一者出自德语世界。两者在心智史领域都很受关注。前者是“剑桥学派”的语言环境学说。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于1969年发表了一篇今天看来仍非常重要的文章,在文中他提出了这一学说。^②他认为我们今天写心智史就是为了理解文本,而为了解释他所说的“理解”文本是什么意思,斯金纳批评了另外两种理解文本的方式。第一种是借助外在于文本的社会因素来解释文本,这样做隐含的前提是认为文本的真实意义是由社会、经济、政治因素所决定。“在语境中理解文本,这样做的基本前提,是认为一个特定的文本一定要放在其社会环境中来理解,但这个前提是错误的。”^③斯金纳承认了解环境是有用的,但是环境并不是行动

① 莫里斯·曼得包姆(Maurice Mandelbaum)《观念史、心智史和哲学史》(The History of Ideas,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历史与理论》副刊(History and Theory) Beiheft,第5卷(1965),第33—66页。

② 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观念史中的意义与理解》(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第8卷(1969),第1期。

③ 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义与理解》,《历史与理论》,第8卷(1969),第1期,第43页。

的必然原因。如果是必然原因,那么为什么有着相同背景、年龄以及近似经验的人,却对环境做出了不同反应?即使有外在于行动者的行动原因,这也不必然意味着理解了这个原因,就可以理解行动者的行动意义。^①

心智史有一个更核心的观点,即认为文本自身是独立的,文本自身就是理解文本意义的关键,对此,斯金纳做了尤为详细的批评。^②他认为心智史的史家,为文本赋予了两种“神话”,两者都来自今人让历史文本从吾所好的阅读方法:第一种神话假定作品可以被归约成原理,而且经常是我们期望它们表达,或假设它们所表现的那些原理。^③第二种则假定一个人的作品都是内在一致的,因此心智史的工作就是去发现思想的一致体系,无视那些矛盾与反常。^④斯金纳认为,我们受制于观念上的狭隘,把后人关于作品历史意义的认识与作者自身的用意牵合一处。我们批评某人没能说出什么话,也不问问当时他是否有讲这番话的心思;而且我们还基于文本和那些假想原理的相似性来寻找“影响”。^⑤

的确,当我们说一个特定的历史人物是“儒家”或受佛教“影响”,我们就是假定他执守某些原则,他的想法内在一致,而并不真正去细致地调查他实际说了些什么。但是历史人物有时也宣称自己的道理内在贯通。当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或者当朱熹说天理就是一贯之理时,他们宣称自己道在一贯,这既是说自己的思想内在一致,也是说自己对种种质疑的回应,条理一致。斯金纳认为,说自己道在一贯,或许不过是要表达期望如此,而非真的在描述自己的成就。他这个说法很对。但他质疑心智史以“观念”为研究主题是否恰当,说:“有人认为‘观念’固定不变,这个想法似是而非……这样的历史……从来不正确……如果只关注

① 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义与理解》,《历史与理论》,第8卷(1969),第1期,第39—45页。

② 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义与理解》,同上,第3页。

③ 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义与理解》,同上,第7—16页。

④ 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义与理解》,同上,第16—22页。

⑤ 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义与理解》,同上,第22—36页。

某些‘观念’，认为以之为基石来探索历史才是恰当的，这是一种概念混乱的想法。”^①他质疑到这个程度，就多走了一步，过犹不及了。

在斯金纳和剑桥学派这里，观念本身消失了。消失的理由很充分，因为如果我们要根据一个人说过什么话，来把某些观念归于他，就需要区分这些话是指称一个观念，还是表达了这个人在特定的时间、地点的特定想法。因此斯金纳就可以做结论说：“书写一个观念的历史，其实就是书写一个句子的历史。”^②“只有关于一个特定表达的不同说法的历史，才是唯一能写的历史。”^③

这样一来，对斯金纳来讲，心智史需要研究各种说法所产生的语言环境。这个“语言学转向”为心智史带来很大改变。^④ 斯金纳接续约翰·奥斯汀(J. L. Austin)，区分了说什么(言语的意义 the meaning of the statement)和与说相伴随的行为(言语的力量 the force of the statement)。要理解心智史，就要既掌握言语的语义(言内意义 the locutionary force)，又掌握言语的意图(施为力量 the illocutionary force)。^⑤ 心智史的研究方法就是要确定“文本的意图是什么，以及这些意图被期望怎样实现”；就是要用这样的方法来理解文本，而不是撰写观念的演变史或一个人的思想传记。

由此可以说，研究观念史，恰当的方法一定首先是描述一个特定的

① 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义与理解》，《历史与理论》，第8卷(1969)，第1期，第35—36页。

② 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义与理解》，同上，第37—38页。

③ 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义与理解》，同上，第39页。

④ 安娜贝尔·布雷特(Annabel Brett)《现在什么是心智史》(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 Now?)，大卫·坎纳丁(David Cannadine)主编《现在什么是历史》(What Is History Now)(伦敦：帕尔格瑞麦克米兰出版社2002)(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2)；马丁·杰伊(Martin Jay)《心智史应该采取语言学转向吗——对哈贝马斯、伽达默尔之争的反思》(Should Intellectual History Take a Linguistic Turn? Reflections on the Habermas-Gadamer Debate)；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和史蒂芬·卡普兰(Steven Kaplan)主编《当代欧洲心智史：再评价与新视角》；泰福斯(Toews)《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心智史：意义的自主性与经验的不可化约性》(Intellectual History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 The Autonomy of Meaning and the Irreducibility of Experience)。

⑤ 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义与理解》，《历史与理论》，第8卷(1969)，第1期，第45—46页。

说法,在它被言说的特定场合,一般都会引起哪些交流,要全面描述这些内容;其次,寻绎这个特定的说法与其丰富的语言环境之间的联系,以此来破解这位特定作者的真实意图。^①

因此,心智史的研究首先是将表达置于其所产生的语境中来分析。这就是为心智史带来巨大改变的“语言学转向”。^② 在更哲学式的研究中,观念以及拥有传记的社会行为者个体会消失,历史研究则关注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s),关注有针对性地回应其他文本的特定文本,以及历史上的行动者所要回应的特定经验。^③

我想学者都会同意,一个人可以通过语言来表达心意和价值观,任何观念都要以语言来言说。尽管文人有时说,做文是因为不能行其道,但在我这本书所讨论的时段里,韩愈和许多人希望文行兼备,并经常从做文,或者像程颐那样,从言说开始。严格地说,历史只留下纸上的文字,我们要弄清楚——当然也只是试着去弄清楚:首先,那些语言表达在哪一点上和当时其他语言表达的环境相适应;第二,它与其他人所说的有何不同。我们再也不能把“观念”当作脱离语言环境的有条有理的原则。有些人认为观念虽产生在过去,却能裨益当今,即使这些人,他们也承认“观念”不能外在于语言环境。^④

第二个潮流是德国学者瑞恩哈特·柯赛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的概念史(conceptual history)。在我看来,它与前面讲的第一个潮流是一致的,也是试图理解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语言结构”)和社会实践

① 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义与理解》,《历史与理论》,第8卷(1969),第1期,第48—49页。

② 安娜贝尔·布雷特(Annabel Brett)《现在什么是心智史?》,马丁·杰伊(Martin Jay)《心智史应该采取语言学转向吗——对哈贝马斯、伽达默尔之争的反思》,以及泰福斯(Toews)《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心智史:意义的自主性与经验的不可化约性》。

③ 泰福斯(Toews)《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心智史:意义的自主性与经验的不可化约性》(第891—892页),对波考克(J. G. A. Pocock)的讨论。

④ 彼得·哥登(Peter E. Gordon)《观念史中的语境主义与批评》(Contextualism and Criticism in the History of Ideas),见达林·麦克马洪(Darrin MacMahon)和萨缪尔·莫森(Samuel Moyn)主编《反思二十一世纪的当代欧洲心智史》(Rethinking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

如何相关。它所运用的方法,历史学者会感到很投缘,因为它询问历史上人们据以理解其环境的概念是什么。这个概念可以是一个词,比如“理”,但要理解它的含义,就要研究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人们如何理解它,以及为什么对于讨论它的人来讲,它是如此重要。“理”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对于它的使用,我们可以做历时的研究,但共时性的研究呈现出朱熹和程颐为之赋予了重要的新含义。^①柯赛勒克注意到有些概念(例如天地),其含义在历史上没有多少变化,有些概念则随时变化,必须做考察(比如“理”或“性”),有些则是为了回应时代而新创造出来的(例如“古文”、“道学”)。^②概念的形成是社会史的一部分,正因为概念的发展,带来新概念、新实践的普及;当然,概念是社会变迁的组成部分(而不是被社会变迁所决定)。^③柯赛勒克对德语中一个关于现代性的概念的发展特别感兴趣,在研究中他提出历史有一个“鞍型期”(saddle period),概念在这个时期加速转变,^④尽管他的讨论针对具体概念,但他关注一个时代所使用的概念,关注这些概念如何转变,这个研究方法构成了一种研究框架,可以适用于对其他时代和地域的研究。

思考中国问题时,想想概念如何在某一特定时期形成以及形成的意义何在,这是很有必要的。例如,在755年安禄山叛乱之后,“文”被提升为支配一切的概念,为文士提供了新的世界组织形式,这一直延续到宋代。文治与武治(或者我们可以用科勒赛克的术语说,就是文、武这对概

① 陈荣捷的研究是历史性的,见所著《新儒学“理”概念的演变》(The Evolution of the Neo-Confucian Concept Li as Principle),《清华学报》(Tsinghua-hua hsueh-pao)第4卷(1964)n. s. 4. 2,第2期,第123—147页;裴德生(Willard J. Peterson)的研究是共时性的,见所著《对理的另一种观察》(Another Look at Li),《宋元学报》(Bulletin of Sung and Yuan Studies),第18卷(1986),第13—32页。

② 瑞恩哈特·柯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以今例古:论历史时间的语义学》(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基思·特赖布(Keith Tribe)译,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2页。

③ 瑞恩哈特·柯塞勒克《以今例古:论历史时间的语义学》,第75—92页。

④ 瑞恩哈特·柯塞勒克《以今例古:论历史时间的语义学》,第222—254页。